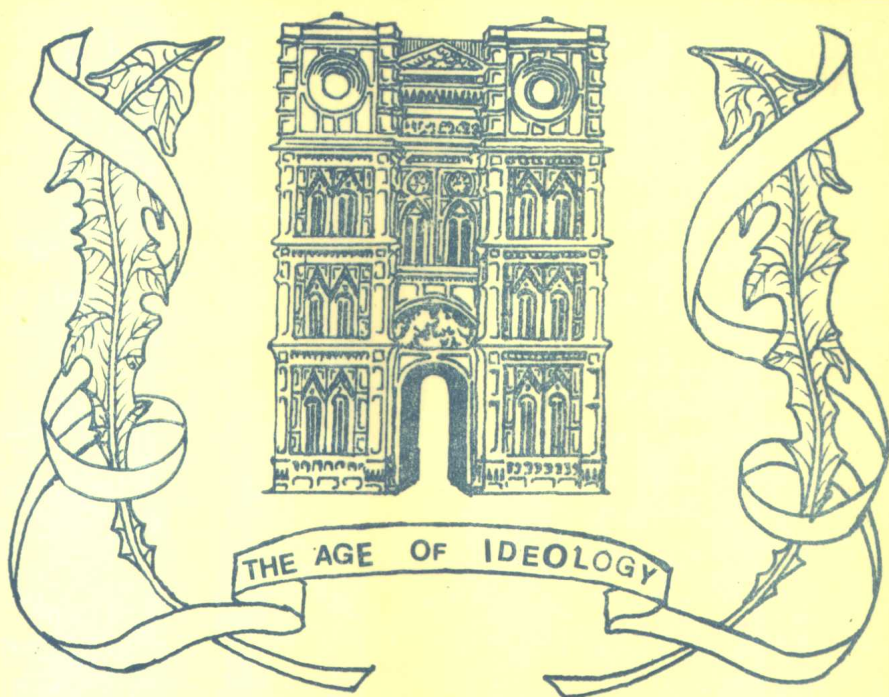


〔美〕H.D. 阿金 编著

思想体系的时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

思想体系的时代

——十九世纪哲学家

〔美〕H·D·阿金 编著

王国良 李飞跃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The Mentor Philosophers

THE AGE OF IDEOLOGY

THE 19TH CENTURY PHILOSOPHERS

© 1956 BY HENRY D. AIKEN

A MENTOR BOOK from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

根据纽约新美世界文库出版社1956年版译出

思想体系的时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00千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1—13,000册 定价: 3.00元

ISBN 7-80014-325-2/B·0015

编者寄语

太阳神——光明之神，智慧之神，生命之神。

太阳神的传说，中外皆有；太阳神的崇拜，源远流长。

远古时，中国就有崇拜日神图腾的历史。古语有：天为神，日为尊；以日为百神之王；天之诸神，莫大于日；天之诸神，唯日为尊，诸说。并流传着与太阳神有关的许多美妙动人的神话故事，诸如“夸父逐日”，“有穷后羿”，“羲和占日”，“凤凰鸟”，“日轮”，“扶桑”之说。

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极为崇拜太阳神阿波罗（又称福玻斯，光辉灿烂之意）。这位宙斯之子裸露着矫健的身躯，肩背七弦琴和神盾，腰悬金箭，斩杀黑暗之神（怪龙Python），庇佑人类。他睿智，顽强，乐观，豁达，洋溢着蓬勃的活力和充盈的热情。他出现之时，黑暗与魑魅便悄然遁去……。

太阳神，是真善美的和谐，象征着正义，智慧与科学；太阳神，是人类热爱生活，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精神升华，启示着幸福、和平与希望。德尔斐神庙前，阿波罗的伟大神喻“认识你自己”，永远是人类希冀的理想和追寻的目标。如是，我们借“太阳神”表明本套丛书的主旨：认识自然和人生的智慧，让科学与理性之光常明。

本套丛书的编者和译者主要是一些青年学子，他们在前辈导师的教诲下，获益非浅，并力图师承前辈的严谨学风和治学精神，在人文科学这块园地里，努力耕耘。同时，他们也真诚地期待读者朋友们凭借一颗渴求真理的心灵，凭借自

身对生活的体验，来阅读、鉴赏、批评这套丛书，从而共同参与一场思想的对话和交流，以探讨，选择各自的人生价值和信念。

“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愿“太阳神”丛书伴随朋友们一起去理解生活的真义，展拓生命的界域！

1988年3月 于北京

献 给

罗佛·巴顿·派瑞

由于他的全面的哲学观、富有人性的和宽容的经验主义，以及在空前未有的文化危机和混乱时代所具有的高度勇气与明智。具有这种人的时代确实仍然是理性时代。

哲学新视野

导师哲学家丛书中的本卷对十九世纪的哲学冲突提出了新的解释，十九世纪是联系十八世纪启蒙的时代与我们二十世纪分析的时代的桥梁。

思想体系的时代由著名的权威编著，提供了这一时代的基本论著并附以相应的介绍与评析，并展示了十九世纪哲学从传统的理性思维主题到强调主体性的转变，这是思想体系与经验科学发现的区别，本卷对前者的原则和宗旨作了彻底的批判性考察。

在这一引人注目的论述中，大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克尔凯戈尔、孔德、斯宾塞与尼采都创立了许多哲学新观念，诸如历史对哲学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存在主义、社会学以及文化的影响。本书同时还揭示了十九世纪把哲学当作人在系统中调整生活的工具的尝试，这是二十世纪实用主义的先驱。

作者亨利·大卫·阿金，现为勃兰克斯大学哲学教授，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执教。

前 言

任何时代的哲学思想比它刚出现时总是更为多样和复杂。无论如何，就对时代杰出的先驱者的一切应有的尊敬而言，十九世纪至少在哲学观念的纯粹数量以及多样化和复杂化方面大大超过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哲学。因此，要找到一个为十九世纪绝大多数主要思想家所共同关心的伟大主题或宗旨是极其困难的。确实，只要把黑格尔与尼采，马克思与穆勒，孔德与克尔凯戈尔这些惊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就会立刻使人想到他们不仅在哲学的气质与风格方面，而且在背景与方法方面有着空前的不同。在十九世纪，整个哲学王朝的兴衰只有短短几年时间，某一学派的专门术语在下一学派中很快就变得不知所然。当这一世纪行将结束，哲学的派别线索也就更为紊乱，以致完全无误地划分其派别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尽管如此，我还发现，呈现于把十九世纪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历

史学家和文献编撰家面前的大量困惑问题之下，有一组很多奇异和困惑归之于它的中心问题。从康德开始，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流行的哲学学科的观念经历了深刻显著的变化，甚至连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如“形而上学”、“逻辑”等的定义最后也变得无法辨认。两千年来没有受到怀疑挑战的问题、论点，现在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并被至今尚未引起注意的其他问题所取代。弥漫于十九世纪哲学论著中的大量模糊、晦涩都是直接与这一事实有关。这就无疑地增加了十九世纪哲学家的深度和创造性，但却使他们更加含混不清和不易阅读。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卷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哲学家的选择就更为困难复杂。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如果不想使本书蜕变为一本无意义的人名录和倾向、引文的汇集，那就不能把这一时代所有重要哲学家都收选进去。我的精心选择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创造性、历史影响、当代的兴趣（interest）。即使这样，我也不得不省去几位哲学家，他们也许完全符合这些入选条件，其中有谢林（Schelling）、边沁（Bentham）和布拉德雷（F · H · Bradley）。然而，如果要把他们收入进去，我将不得不剔下其他几位，但由于某种原因或有其他原因，要去掉他们几位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不过，我可以告诫读者，十九世纪的哲学是如此丰富多彩，我这里提供的一瞥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思想体系的时代是为有思想的读者而写，不可能对评论家们有见地的争论感兴趣，但本书探索的一些问题也许正与他们知识上与精神上的困惑迷茫有关系，也许能使我们这一时代从前辈继承而来的思想体系的冲突清晰明白地显露出来。我努力以这种合理要求为准，决不歪曲我们所提及的哲学家。一句话，我的目的是为那些认为哲学的反映不是一种危险的

享受，而是人类生活行为必不可少的助手的人而写，同时，这些人相信，如果一个人别无所知，则坚持苏格拉底的格言“认识你自己”是不可能的。倘若读者能够在康德或穆勒或尼采的思想中发现一些解决他自己思考已久的问题的线索，或由此刺激他进一步去阅读这些伟人的著作，我就完成了我所期望做的一切。

作为本书确定的方针，也许有人奇怪为什么我不选择那些思想体系特征更为明显和确切的原著。例如，为什么收入穆勒的“论自然”而不收入他的“论自由”或“功利主义”；为什么选择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不选他的“共产党宣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恰恰涉及我的十九世纪作为思想体系时代的观念的实质。没有人怀疑“论自由”或“共产党宣言”作为特别的思想体系的重要意义，它们象征着在我们时代达到高峰的宏大思想体系的斗争。人们也许还不十分清楚地理解的是，十九世纪哲学家的越是基本的学说就越是具有广泛的思想体系的特征。通过一个奇怪的悖论，伊曼努尔·康德，敲响了思辨形而上学的丧钟，却又在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中开创了形而上学的伟大复兴。而且，正如我们当下所见，他们的形而上学体系是早期的哲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费希特的形而上学与笛卡尔或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理论的差别，而是涉及到形而上学的主题的意义与目的的区别。从本质上说，这种不同是寻求关于存在的最普遍特征的理论知识与试图建立作为一个人，作为个体，作为理性的人或文明人的基本信念的两种探索方式的不同。笛卡尔以及在他之前的亚里斯多德把形而上学看作只是特殊科学探索的持续，他们只在范围与程度上有所不同。对于费希特来说则恰恰相反，他的立场和方法本质上是

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他的理论所表现的不是对实在事实的陈述，而是对人类生活来说是基本的约定或义务。

所以，我的论题不只是在本质特征上属于思想体系的十九世纪哲学家的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学说，而且也是自康德以来就不断意识到的，不属于任何常识意义上的“科学”、只属于没有其他词汇可以表达其意义、只有“思想体系”这一范畴可表现其内容的哲学批判的基本任务。

在我所论及的各个哲学家的特征的范围内，得到许多注释者的有益帮助，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我对我有意无意地采纳他们见解的人表示感谢。可是，有几个人我想特别地表示感谢。其中第一个人是我的妻子，莱莲·沃德斯·阿金，她聪敏地、富有帮助地阅读了我的手稿的每一部分。我的朋友和同事保尔·兹弗，阅读了相当一部分并与我讨论了我所论述的最后几位哲学家。我想热情感谢他对我的促进和鼓励。还有两位同事，摩顿·瓦尔特和W·V·魁奈，许多年来精神上的合作与信任，使我特别乐意向他们表示谢意，我想我探索哲学前景与他们不是毫无关系的。前者的“历史感”比我自己的要深刻得多，我依赖它比他知道的要更多。但是，我最大的恩惠得自罗佛·巴顿·派瑞，本书充满深情与尊敬地献给他，在我第一次进入哈佛读研究生期间他传输给了我第一流的水平。

亨利·大卫·阿金于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

目 录

1.	第一章	十九世纪的哲学和思想体系
16.	第二章	近代哲学中的先验转折： 伊曼努尔·康德
41.	第三章	德国哲学中的自我主义： 约翰·哥特利勃·弗希特
64.	第四章	辩证法和历史： 黑格尔
92.	第五章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阿瑟·叔本华
112.	第六章	实证主义之父：奥古斯特· 孔德
135.	第七章	自由主义的圣徒：约翰·斯 图亚特·穆勒
159.	第八章	进化论的传道者：赫伯特· 斯宾塞
179.	第九章	辩证法与唯物主义：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197.	第十章	没有救世主的拯救：弗里德里希·尼采
219.	第十一章	存在主义的出现：索伦·克尔凯戈尔
239.	第十二章	启蒙的复归：恩斯特·马赫
255.	第十三章	非科学的最后附言
266.		推荐进一步读物
273.		

第一章 十九世纪的哲学和思想体系

介于伊曼努尔·康德和恩斯特·马赫之间的近代哲学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刚被大卫·休谟摧毁又被康德庄重地宣判死刑的形而上学，在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中经历了一场半奇迹似的复活；在赫伯特·斯宾塞的进化自然主义中过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新的生活；在卡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它的永恒的寓所。思想体系的时代也是形而上学最绚丽多彩的学科——历史哲学花卉怒放、并带来了关于历史发展的本性和人的命运的宏大理论的完全丰收的时期。因此，乍一看去，似乎十九世纪不象十八世纪，它与其说是一个承认哲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如果不是人类自身）是人这一原则的社会和政治批判的世纪，不如说是一个关于终极实在的本性的非批判的甚至是无拘束的思辨的时代。

即使这样的一种描述被允许毫无限制地通过，我们仍有理由把十九世纪称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时代”。“思想体系”（ideology）这一术语的多种意思之一，是指“理想的或抽象的思辨和想象的推理”，但是，从总体上对十九世纪的哲学作这样一种规定是不完全的，甚至限于形而上学本身来看，

这种规定也漏掉了十九世纪哲学思想的基本方向和趋势。如果我们回到韦伯斯特 (Webster)，我们将发现“思想体系”这一术语有某些其他的意思，这些其他的意思更符合于我把十九世纪规定为思想体系的时代的想法。“思想体系”这一术语的这些意思之一是指“关于现象，特别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现象的一种观念的体系；一个阶级或一个个体特有的思想方式”。但是，一个人对“思想体系”的这种意思考虑得越严密，上述定义似乎就变得越含混，因为定义的第一部分意指一种关于现象，特别是社会现象的理论，而第二部分则不是意指一种理论，而是意指一种思想的方式或一种态度的体系 (system of attitudes)。前者使人想起描述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某物的客观命题；后者使人想起的却不是一些或真或假的命题，而是某种较为主观的东西，它表示一个个体或团体用以看待实在的方式。我认为这种含混不清或模棱两可可是内在于“思想体系”这一术语的通常使用之中的。十九世纪最特有的那种哲学推理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模棱两可。正是因为多数十九世纪的哲学家是在某种被设想、设定、意愿或渴求的思维形式下来思考任何命题，所以人们决不能完全确定他们什么时候是在谈思维方式，什么时候在谈思维方式的对象。他们经常是同时在谈思维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对象。或者最好说，他们是同时在谈思维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对二者来说都是基本的。他们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谈论，这便是我们在本书中将讨论的大部分问题。但是，不论正确还是错误，这种观念都表现了与早期的哲学沉思的一种背离，最后它导向了对哲学活动本身的一种全新的理解。

在以往的时期中，哲学家们已非常关心方法问题。但是

总的来说，他们没有认真怀疑过一种普遍的、独立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理解的客观实在。他们也没有询问是否存在一种为理性动物所共有的思维实在的客观方式，这种思维实在的客观方式不会根本改变或歪曲被知之物。实际上，他们没有深思客观性的概念本身，他们仅用客观性的概念去表示一种半自觉的确信，即确信理性能力足以把握它的对象，以及物自身和被知物之间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他们所谓的“理性”既被设想为自然规律通过它而被理解的理智能力，又被设想为理智能力所理解的自然的秩序或规律。人对于实在的思想和实在本身之间的关系从而被视为是一种没有歪曲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也被想成是一种外部关系，它对被知物的内在特性毫无影响。照此看来，人类的心灵和知识的真正对象之间的前定和谐，是一种神圣的奇迹，人类对此只能表示感激。

但是，从康德的时代起，假定心灵与它的对象之间存在一种前定的对应关系的看法，已被视为是独断的和非批判的了。如果事物中的理性和我们认作有效地思维任何对象之标准的理性是同一的，那么这仅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预定：若任何对象要被我们认为是“实在的”，那么它必须符合什么条件。简言之，确立客观性标准的正是思维主体自身；如果世界不是叔本华所错误地认为的“我的表象”，那么，只有在世界符合于我们的概念的限度内，世界对我们而言才是实在的，我们的概念规定了任何实在的事物必须是什么。

对实在的每一种哲学描述，既然都预定了思维这种实在的方法，预定了一套仅为它的制造者所接受的概念组织的规则或原则，因此，主观性的因素无论怎样巧妙地被加以伪装，皆永远不可能从任何一种哲学体系中完全排除出去。不管自